

野火之后

当代台湾新闻业观察、反思与批判

向芬 著

野火之后

当代台湾新闻业观察、反思与批判

向芬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火之后：当代台湾新闻业观察、反思与批判 / 向

芬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08-5819-2

I. ①野… II. ①向… III. ①新闻事业-研究-台湾
-现代 IV. ①G219.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416 号

野火之后：当代台湾新闻业观察、反思与批判

作 者	向 芬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819-2
定 价	5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公共服务媒体必须是领头羊

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前辈作家、媒体人王鼎钧几年前写了一本书《文学江湖》。读过之后，有一则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与蒋介石有关。

当时，蒋介石七十岁。好事者要祝寿，提口号，说“人生七十才开始”。这则新闻四处飞传，进入了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新闻部，也曾经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的王大空看到新闻报道后，很快接了一句话：“才开始生病。”

作者没有多说。但是，在1957年的台湾，何以比他资深的王大空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先后担任了新闻部与节目部主任，个中必有蹊跷。个人的故事，往往可以反映，或者折射社会历史。《文学江湖》留下的空间，就是来者发挥的余地。

向芬博士的访谈，同样具备这层用心。其中，从事调查报道成绩斐然、目前主持评论园地的何荣幸，有个看法，值得凸显与追问。他说，有为的当局“应该带领人民建立对公共媒体的认识，去制定政策、移拨资源……让它不断壮大……（才）不至于担心整个媒体的生态被商业媒体牵着鼻子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是有成绩，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呈现高度成长而分配相对平等。

然而，如果国民党的经济成绩可观，何以传媒与文化的建设，乏善可陈？台湾当局有没有建设公共媒体的认知呢？多数学界与政界人士，可能会说，没有。

不过，颜色固然有黑有白，却也有中间色带。同理，人生与事理不乏黑白分明之际，但更多时候，会有深浅不一的灰色。当局是否有建立公共媒体的认知，同样可以作此考察。

早在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同时是中央社社长、担任国民党文宣工作第二把手的曾虚白，衔蒋介石之令考察西方电视回

台后，写了一篇《迎头创建电视事业的重要》。娱乐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政治高压年代也是如此，曾虚白并不否认。但他显然希望，若要发展电视，必须兼顾“新闻与教育节目”，因为台湾当年的各级教师都不够，通过电视教学，“一人上课，上万学生同时听课……解决了师资的问题”。如果娱乐、新闻与教育，缺一不可，那么，电视的财政来源，就不能依靠广告而走商业路线。

天不从人愿，台湾的电视从一开始，就是商业挂帅，收入只靠广告，教育电视聊备一格。何以蒋介石倚重的幕僚，建言未见采纳？关于台湾当局是否认知公共电视体制的意义与重要性，这可能是第一个重要，但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到了1965年，当局开始要制订第一部“广播电视法”，各方开始跃动。曾氏在1968年再写《三民主义大众传播制度的研究》，强调“大众传播事业皆应公营……切勿误会公营是‘国营’或政府营。这个公，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社会大众，故其权力的构成重心于民意代表，地区人民代表，职业团体代表以及最孚众望的社会名流及法学权威。政府代表亦应参加，但不处指导地位，只作联系与疏导解释工作……先进国家除美国外电视皆为公营。”

时代进入求变的阶段，更弦易辙、重拾公共精神并且付诸实践的呼声，已经增加。1967年，由政大转身，出掌首任“文化局长”的王洪钧，以及负责担任“广电法”起草召集人的李瞻教授，无不推崇公共体制。诡异的是，“文化局”在1973年寿终正寝。广电“立法”工作顿失文化的奥援，继起主导的机构，是职司政经宣传的“新闻局”，公共媒体无枝可栖。公共媒体再次获得正视，已经到了1980年。孙运璿以“阁揆”的身份，在台北市木栅主持第一梯次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时，“主张设公共电视台”。但四年后，孙氏中风，人一违和，政策跟着歇息。

如果当年的“文化局”没有遭到意外裁撤，假使孙运璿身体康健再有十年，台湾的公共媒体是不是可能会更早诞生，从而就有更好的机会，成为传媒的市场领导者，不但拥有消极自由，从事报道与评论而不会动辄得咎，同时拥有积极自由，凭借比较充分的资源，稳定地生产质量俱佳的传媒内容？探索台湾当局与公共媒体关系之时，这是第二组让人悬念的疑惑。

解严之后，台湾从1990年起，第三度要创设公共电视，规模不小。当局的原始构想，是要让这家公共媒体与当时三家商业无线电视台，分庭抗礼，年度预算设定在60亿新台币。让人费解的是，1997年入春，国民党突

然宣布，停止建台。直到现在，国民党都能控制民意机关半数以上的代表，彼时更是强大。何以满朝权在手，偏偏不把令来行，丰富文化的建设？行政权与立法权都能稳稳掌握的执政者，竟然不顾责任与社会颜面，公然违反自己的施政允诺。更离奇的是，不说废台则已，休字方甫出口，社会各个角落支持公共媒体，平日难见身影的多方力量，却在顷刻之间，倾巢而出，有如排山倒海的压力，致使国民党当局不单收回成命，并且快马加鞭，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已通过“公共电视法”，公视并在次年（1998年）开播，但预算减少为15亿。

国民党是想要缩小公视规模，故意以退为进，宣布废台是为缩小公共媒体所做的策略准备吗？若真如此，为何又要缩小其规模？这是第三组有待厘清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情势再见变化。民进党当局发现，根据其竞选蓝图的承诺，必须扩大公共媒体的规模。既有这个格局，民进党当中具有公共媒体认识的人，就与媒体改革团体有所呼应，进而寻求跨党派有识之士的支持，最终在2006年初“修法”后，扩大了公共媒体的规模，有了公共电视集团的骨架，虽然纳税人通过当局提供的经费，不能说有大幅增加。持平回顾，直至2008年再次政党轮替之前，台湾公共广电集团即便前进的速度太过缓慢，仍然走在正确的道路。其后至今，台湾的公共媒体进入不进则退的窘境。个中究竟是哪些道理，才能解说过去七年以来，台湾公共媒体的困局？又怎么评价民进党在执政五年多之后，才能启动了扩大公共媒体的步伐，完全只是因为民进党未能掌握立法权吗？

向芬博士说，本书受访者的“共同期待”，就在追求“有序合理的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理想的媒体环境”。确实，如果容许附丽，我们应该说，合理政策所要形塑与凸显的媒体环境，就在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PSM）必须壮大，成为台湾传媒的领头羊。

2015年6月2日

走政大山·猴山796次翌日

序二 我们找到星星了吗？

何荣幸（台湾资深媒体人）

如果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是在漫漫长夜中辨认、追寻星星的方向。那么，解除戒严将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找到星星了吗？

二〇〇八年一月，我和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师生合作，出版了《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一书。以“黑夜”比喻戒严时期，“星星”则代表对于民主的渴望，此书从资深记者的角度，观察台湾迈向民主化的轨迹。

当时，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管制”与“自由”。新闻自由如何在威权管制中萌芽？台湾媒体又如何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是一九九〇年代台湾告别黑夜、拥抱星星的重要过程。

然而，从二十世纪末狂飙年代迄今，台湾媒体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辩证关系中，更加入了“市场”与“责任”这两个关键词。

不少人认为，台湾民主化已过度自由而缺乏责任；在此同时，台湾社会对于市场与管制的界限仍争论不休。无论如何，“星星”的亮度会持续闪闪发光或逐渐黯淡，已取决于对这四个关键词的深度探讨与持续思辨。

向芬的这本书在此时提醒两岸读者，重新思考自由、责任、市场、管制这四个关键词的连带关系与交错作用。

对台湾新闻工作者而言，此书无异再度提问：我们真的找到“星星”了吗？或者更精确地说，当年隐藏在庞大乌云背后最亮的那一颗星星，在新世纪能够指引台湾找到民主深化的新方向吗？

当局对媒体乱象难辞其咎

《黑夜中寻找星星》书中，资深记者江春男（笔名司马文武）曾经描述，在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台湾党外杂志与“警总”玩“捉迷

藏”的故事。

江春男指出，在那段充满肃杀气息的日子，“警备总部”每回都拿着盖好“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的公文来查禁党外杂志。但党外杂志编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杂志还没印出来，情治人员就已经“未卜先知”知道内容会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

久而久之，江春男等人逐渐与情治人员形成“共生关系”，在“捉迷藏”中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他们会先印出两千本党外杂志用来“被查禁”，等到印刷厂拿到检举奖金、“警总”也完成查禁任务后，他们才开始印出真正要发行的分量。到最后“皆大欢喜”，情治人员、印刷厂都可以交差，发行达一两万本的党外杂志则营运蒸蒸日上。

上述当局管制言论自由与新闻内容的情况，如今早已不复见。台湾解除戒严至今，当局已难以直接控制、干预新闻内容，这无疑是民主化的重要进展。本书则进一步描绘了党政军控制“从硬到软”的过程：

就深度访谈结果总体而言，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在戒严时期党政军特一条鞭式地严密控制媒体。伴随民主转型的进程，党政军对媒体的控制由硬转软，报禁解除只是台湾民主的自然产物。民主转型实现后，昔日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走下神坛沦为媒体新闻报道的“资本”，当局相关部门的管理政策则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台湾新闻传播总体而言是基于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能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当局逐渐把钳制媒体的手拿开之际，却以自由化、市场化为名，放弃对于健全多元传播生态的努力，更放弃对于媒体产业的合理管制。久而久之，如同台湾民主在建构制度后尚无法深化质量，媒体发展也在当局无能与失职下，出现全台有线电视系统遭到极少数集团垄断、过多电视台恶性竞争形成社会乱源等结构性乱象。

证诸欧美民主国家的媒体发展经验，电波带宽属于稀有财及全民公共财，媒体质量更攸关民主能否健全发展，因此，“尊重市场机制”与“采取合理管制”绝非两条并行线，负责任的当局，必然会在两者之间求取最大平衡，而不会以市场机制为名行完全放任之实。

如果台湾在漫漫长夜费尽千辛万苦追寻的“星星”，只是“完全顺应市场机制的民主化与媒体发展”，这样的星星虽然有其在特定时空下的价值，却无法健全台湾多元民主与传播生态，更难以协助媒体产业健全发展而提升

民主质量。这样的星星，无法引领台湾民主与媒体发展继续前行。

公广集团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在 2008 年曾以“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湾的游击媒介与政治运动”为题指出：

解严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进历史废堆，媒介从检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这是不可轻易抹煞的成就。可惜台湾未进一步建构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场在戒严时期抗衡政府的媒体控制，解严后却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媒介自由的羁绊；市场控制比政府控制较不着痕迹，后果却一样不可小觑。目前，任由这许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场秩序中厮杀，个个都是财务的输家，但最大的牺牲者莫过于“公共领域”。

对于台湾当局应该扮演的角色，本书提出了几个疑问：社会大众需要的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景象？自由与秩序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何处？这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能避免市场之虞带来的极端商业主义和垄断控制？台湾当局如何能在管制的同时仍能尊重新闻自由？如何能在自由和管控的悖论中找寻到适当的新闻传播政策，或许是未来需要长远考虑和规划的。向芬认为应“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并且对此予以了完整说明：台湾在报禁解除之初，欢欣鼓舞地迎接全面的自由开放，时过境迁，在反思之时不断提到台湾当局传播政策的失误，即“没有采取优先发展和壮大公共媒体的政策，而是迎媚地按照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开放”。以电视为例，台湾让第四家无线电视台出现，并把所有的电台、频道释出，让有线电视台蓬勃发展，等到商业竞争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推公共媒体。可是，在这样顺序颠倒的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公共媒体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对于公共媒体始终缺乏应有认知和支持，在解除报禁后民众也没这方面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比较有担当和方向感的当局，应该带领人民建立对公共媒体的认识，去制定政策、移拨资源，支持类似 BBC、NHK 这样的公共媒体，让它不断壮大，接着才开始发展商业媒体。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发展，就会比较可能对公共媒体有认识、有支持，公共媒体有影响力，就不至于担心整个媒体的生态被商业媒体牵着鼻子走。

我个人长期参与台湾的媒体公共化运动，了解公共广播电视媒体集团

(简称公广集团)在台湾“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但正因台湾媒体发展已在市场竞争下饱受抨击,台湾当局更应拿出魄力制定长远传播政策,对公广集团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才能在市场机制与行政管制间找到着力点与平衡点。

就此而言,当前台湾民主化与媒体发展需要的“星星”,已经跟戒严时期的追求大不相同。不论是否支持“壮大公广集团”策略路线,台湾当局必须提出具有前瞻视野的传播政策以促进民主深化,已是台湾当局无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迎向新时代挑战

透过本书回顾台湾民主化历程与新闻传播制度变迁,读者更可了解,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争取;健全的媒体环境也无法一蹴可及,当局订定前瞻性传播政策、媒体善尽社会责任、公民社会的成熟壮大都是重要配套条件。

我在担任《天下杂志》总主笔期间接受向芬访问,对于她的事前周全准备、深入提问与追问都留下深刻印象,更欣见本书的深度访谈成果,为台湾新闻发展经验留下重要记录(必须提醒的是,本书判定受访者的政治光谱归类,未必精准公允,但不致影响其受访内容的参考价值)。

本书出版之际,我已创办台湾网络新媒体《报道者》,致力于以网络新科技、数字叙事工具呈现深度调查报告。我深信,无论媒体形式如何变迁,媒体在民主生活中都将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期待社会各界珍惜与呵护得来不易的新闻自由,并在此基础上迎向媒体新时代的更大挑战。

2015年11月2日

目 录

序一 公共服务媒体必须是领头羊	(1)
序二 我们找到星星了吗?	(5)
第一章 通天塔与不归路：从报禁到解禁	(1)
一、行政管制与自由市场	(6)
(一) 党政军控制媒体和高校内化教育	(6)
(二) 由硬转软的控制	(8)
(三) 自由市场的媒体乱象	(10)
二、侍从媒体与政治合谋	(13)
(一) 强人阴影下的侍从媒体	(13)
(二) 台湾媒体是民主的推手还是权力的跟从?	(14)
(三) 新政商关系——合谋的伙伴	(15)
三、西化影响与本土意识	(17)
(一) 自由主义思潮对解除报禁的影响	(17)
(二) 新闻传播政策制定中的唯西方论	(19)
四、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媒体环境	(19)
(一) 以“非无限”的自由与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场之虞	(20)
(二) 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	(22)
第二章 野火之后：台湾媒体市场、行政管控与新闻自由	(23)
一、何谓新闻自由?	(23)
(一) 欠缺共识的新闻自由	(23)
(二) 作为制度性权利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和重叠	(25)
(三) 媒体的自由与民众的自由	(25)
(四) 消极的新闻自由和积极的新闻自由	(26)
二、台湾媒体解严后仍被诟病缺乏新闻自由的症结	(27)
(一) 第四权的适用与局限：媒体的特权与限权	(27)

(二) 自由放任论的终点：媒体所有权与多元化市场	(32)
(三) 社会责任论的乌托邦？——人民利益、政府作为与 媒体操守	(36)
三、寻路台湾：新闻自由如何构建？	(41)
(一) 结构性管制：以权力的制衡来保障新闻自由	(41)
(二) 合理的社会结构促进媒体多元化和自由度	(42)
(三) 偏重公共媒体的多元资源	(44)
第三章 台湾新闻学界访谈录	(46)
一、郑贞铭访谈录	(46)
二、冯建三访谈录	(61)
三、林元辉访谈录	(75)
四、林丽云访谈录	(101)
五、苏蘅访谈录	(116)
六、陈百龄访谈录	(131)
七、倪炎元访谈录	(153)
第四章 台湾新闻业界访谈录	(168)
一、陈国祥访谈录	(168)
二、尤英夫访谈录	(181)
三、何荣幸访谈录	(188)
四、邱家宜访谈录	(202)
五、程宗明访谈录	(219)
第五章 台湾新闻管理界访谈录	(237)
一、邵玉铭访谈录	(237)
二、苏正平访谈录	(247)
后记	(271)

第一章 通天塔与不归路：从报禁到解禁

台湾在戒严时期实行“限张、限印、限证”的报禁政策；在“白色恐怖”时期，媒体有两大报业集团的蓬勃发展，有老三台的垄断经营，也有党外杂志和异议报刊对国民党当局的抗争。伴随民主转型，台湾媒体走过报禁时期，迎来了全面自由开放，同时也出现了媒体政治光谱的明显分化、商业势力的极端垄断、新闻品质下降和媒体视野狭小等现实问题。通过一系列深度访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世代的集体记忆，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全面和透彻的台湾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的历史过往和现实状况。

本研究基于以下研究问题展开：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是否起到推手的作用？报禁解除是否是民主转型的必然产物？民主转型前后当局对媒体的控制与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民主转型过程中裹挟而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台湾媒体政策的影响力如何？为了解台湾新闻传播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笔者对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和管理界核心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所谓深度访谈，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其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者进行大量改进；二是要深入事实内部。^① 因此笔者围绕上述研究问题在访谈前给被访者事先通过邮件发送了访谈提纲，希望被访者回答如下问题：

1. 提到报禁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 报禁时期，当局管控媒体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哪些？
3. 报禁时期，政治领袖对媒体的影响如何？
4. 您认为是什么促成了报禁开放？请列举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5. 您认为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6. 解禁后，台湾媒体与当局之间的关系有些什么变化？
7. 解禁后，台湾政治领袖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如何？

^① Wengraf, Tom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Biographic Narrative and Sem-istructured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3.

8. 有一种说法认为,解禁后的台湾媒体陷入新的政商关系之中?您怎么认为?

9. 现在的新闻传播主管单位与报禁时期相比有哪些变更?他们的管理方式有哪些变化?

10. 您认为台湾现行的新闻法规为新闻自由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吗?

11. 您认为台湾现行的新闻传播制度是基于什么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12. 您认为台湾民主转型后,现行新闻传播制度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以上半结构式的访谈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问题内在的逻辑是第1至第4个问题为报禁时期主要情况、第5至第8个问题为解禁后主要情况、第9至第12个问题是对新闻传播制度的总体性评述。在正式访谈前,访谈者再结合被访者的背景资料和实际情况在上述12个问题基础上因人而异地做部分修改,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无法预知的,访谈者根据实际情况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听取被访者的叙述。^①

在访谈的一开始以“提到报禁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开场,用“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从一般化的日常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逐步展开,使被访者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被访者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访谈研究得以更进一步的基础。访谈者在访谈的开始阶段与被访者共同建立地方性文化的情境,将话题更多地引向被访者的生活史。这不仅因为生活史一般都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助于我们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达到深度访谈之深度,因为生平阐释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②

但是访谈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在对被访者的意义研究中,我们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能够达到一种普遍化的认识。虽然在代表性上仍有缺陷,但是所获得资料的有效性较高。对个体的理解

① Hakim, Catherine 1987, *Research Design : Strategies and Choices in the Design of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llen& Unwin. P27.

② Chamberlayne, Prue, Joanna Boornat & Tom Wengraf 2000, *The Turn to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Comparative Issues and Examples*. New York: Routledge. P9.

包括了意义的归置、因果关联、类型化，而不仅仅是细节性的描述，而这正是研究者期望通过深度访谈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即发展出关于社会及其构成结构与过程、发展的概化知识，对于个体的理解也一直服从于这一目标，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原始知识可以来自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①

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同样能够考察到更广范围的社会变迁历史进程。在这些试图将分析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联系起来的的研究中，个人生活史能将一定时期内的前后衔接起来，所以能够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因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由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获得了一种共性。对于个人生活史的访谈本身就显现出一种社会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通过被访者的讲述去进一步发现这样的社会变迁最后在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叙述来发现地方性资料，从而达到对地方性社会的了解。由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就充分显示了其口述史特征，从而可以“小中见大”做出有意义的研究。^②

台湾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和管理界相关人士对访谈提纲中所提到的问题最有发言权。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笔者对相关人士进行总计约26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的采访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为确保完整准确记录访谈内容，采访全程录音，随后逐句听写录入电脑。

受访者的共同特征体现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有多年教学、研究或新闻实务经历；供职于高校、新闻机构或行政部门；深谙台湾新闻传播业发展状况的资深人士。其详细信息如下（见表一）：

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多元平衡，在政治倾向、年龄段和职业等方面，受访者的不同特征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受访者的政治光谱来分析，偏蓝的有5位，偏绿的有6位，居于中立的5位，选取受访对象的时候基本考虑到政治倾向的平衡问题，以使多元的观点能够在访谈中得以充分体现。

① Rustin, Micheal 2000, "Reflections on the Biographic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 The Turn to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Comparative Issues and Examples." (eds.) by Prue Chamberlayne, Joanna Boornat & Tom Wengraf. New York: Routledge. P42-45.

② 以上对于深度访谈方法的讨论部分，均转引自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58—60页。

表一 受访者简介（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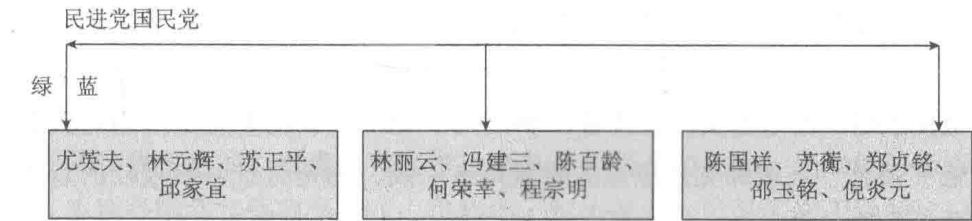
姓名	年龄	性别	所属党派及政治倾向 ^①	供职单位及职务职称	访谈时间
林丽云	1965	女	无党派；中立。一般不会投国民党，但也不等于投给民进党。	现为台湾大学教授，媒体改造学社召集人。	2013年 8月1日
苏蘅	1955	女	偏蓝。曾任政务官，理论上应该有国民党党籍。	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曾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主任委员”。	2013年 8月7日
冯建三	1959	男	无党派；中立。一般不会投国民党，但也不等于投给民进党。	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媒体改造学社理事长；曾任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	2013年 8月9日
林元辉	1954	男	无党派；偏绿。不会投国民党。	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2013年 8月13日、 2013年 8月19日
程宗明	1964	男	中间偏绿。一般不会投国民党，但也不等于投给民进党。	现为“公共电视”研究员及工会理事。	2013年 8月14日
邱家宜	1964	女	偏绿。	现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执行长。	2013年 8月14日
陈国祥	1953	男	国民党；蓝。	现为中央通讯社董事长，“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曾任《自立晚报》总编辑、《中国时报》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	2013年 8月15日
尤英夫	1939	男	无党派；偏绿。不会投国民党。	现为世界联合法律事务所律师，赛珍珠基金会董事长；曾任台北律师公会、比较法学会理事，曾创办《中外法学》杂志。	2013年 8月16日
陈百龄	1958	男	中立。不会投国民党，但也不等于投给民进党。	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2013年 8月16日

① 关于“所属党派及政治倾向”一栏，是笔者征求了多位相关人士的意见综合得来，其中有人在回信中写道“我猜，除了出任政府官员之外，多数人都没有加入政党”。还有人回复：“所属党派因台湾已实施个资保护法，除非从政自然曝光，否则当事人多讳莫如深，不易查证；政治倾向，除非确属党人，否则主观论断易有失。”关于党籍信息的查找，得到的回复则有“估计不太好查，或说我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查到。因为一般登记数据时，没有这个栏目需要填写。”“党籍讯息除非这人有参选公职一般而言不容易查”。从这些回复信息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台湾政治和党派的一些基本情况。笔者本人对受访者及治光谱归类未必准确，仅作学术研究参考之用。受访者的意见不代表笔者本人的意见。

续表

姓名	年龄	性别	所属党派及政治倾向	供职单位及职务职称	访谈时间
何荣幸	1966	男	无党派；中立。不会投国民党，但也不等于投给民进党。	现为网络媒体“报道者”创办人；曾任《天下杂志》总主笔兼“独立评论@天下”网站主编，《自由时报》市政组组长，《中国时报》副总编，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创会会长，媒体改造学社执委。	2013 年 8 月 19 日
苏正平	1950	男	无党派；偏绿。不会投国民党。	现为“新头壳网”董事长；曾任《台湾日报》总主笔，台湾记者协会会长，“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中央通讯社董事长。	2013 年 8 月 28 日
郑贞铭	1936	男	国民党；蓝。	文化大学新闻学系教授（退休）；曾任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香港时报》董事长，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3 年 10 月 22 日
邵玉铭	1938	男	国民党；蓝。	现为“公共电视”董事长；曾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中央日报》董事长。	2013 年 11 月 27 日
倪炎元	1957	男	偏蓝。	现为台湾铭传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时报》总主笔。	2014 年 4 月 3 日

（备注：以上个人信息更新截止时间为 2015 年年底）



图一 受访者政治光谱

就受访者年龄来看，30 年代 3 位，40 年代 1 位，50 年代 7 位，60 年代 4 位，50 年代的人士占总数的 47%，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士大部分目前正居于学界和业界的重要岗位，是目前该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的一批人。就受访者现在从事的职业来看，学界有 7 位，实务界有 7 位。